

吴昊 / 编



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中
国

吴昊 / 编

年代诗歌精选

新疆人民出版社

安多鱼宴

《第 1 首》

尖语之宴：想起约会

精心准备的时间
在正午的阳光下碎裂
洋铁皮屋顶上的水
总是通向看不见的地方

被遗忘的眼睛 离开老去的

吠声不断的狗

我们又开始游水

那边的玩法新鲜吗

那边的女子 是否也在激动过后

却流下冰凉的水

悉心地板上回春

折脚的笑脸虽然存在

可香味却像昨天

桔红色火机在手指间转动

灯光深藏于内心的

飞翔、飞翔、飞翔之路

虽然铺展白纸 握管引笔

也可写不出那无憾、无憾、无遗憾的

多少次拿出来

又匆忙藏起的

……自由

圣地之宴：无棠随瘦骨苍苍而远去

1966 最后一匹马儿

留下圈回蹄痕跟上车轮的脚步

流放的人生就此从高处消失

还有花朵！还有花朵！

花朵般的女儿途经此处 如风过云隙

在布达拉梯阶官墙上观望

拉萨的骰子 安多的经文 我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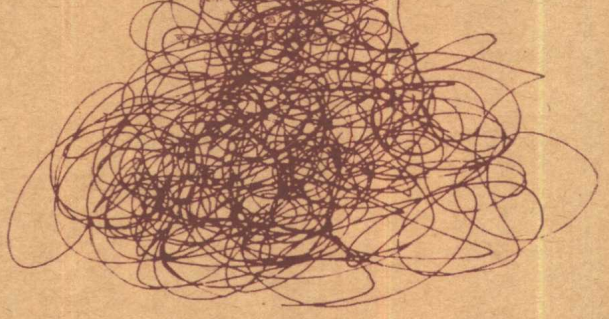
直到神也离开

那一年最后一匹马儿 刚像远远

转世的路上一眼即逝

生不逢时的马儿 转世来到安多

转世来到安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吴昊编.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9

ISBN 7-228-06456-9

I. 中... II. 吴...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0950 号

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

吴昊 编

出版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北京市巨山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1.5
印 数:1~10000 册

ISBN 7-228-06456-9/I·2376

定价:18.00 元

开卷断想

坦率地说,我不是诗圈中人,基本不写诗,更不是诗评家,要编选出这么大规模的诗选集,似乎有些缺乏底气,因此我深知这项工程的难度,它需要足够的胆量和信心,还需要一种眼光,一点精神。对于当代诗歌以及它的现状、发展和命运,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我充其量算一个忠实的看客、局外人、旁观者。旁观者自有旁观者的视觉和眼光,但愿旁观者清。正如球迷品评球星踢的好球和臭球一样,诗迷也知道为好诗喝彩为臭诗捶胸顿足,甚至吐口水。只不过如今牵挂着诗歌并与诗人同甘苦共荣辱的诗迷已经委实不多。这年头“读者就是上帝”,不知道在孤独的诗人眼里他们算不算“上帝”?不过作为诗歌读者的我,选编这本诗集当然会坚守诗歌的读者立场。这与降低审美标准去讨好读者是两码事。

其实最初所想到的,仅是为自己研究方便而选一本供自己或友人参考查阅的读本,未曾考虑过出版的事。但后来,有感于九十年代的十年间中国新潮诗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完整呈现这种变化的诗选文本在市面上比较少见。这样的尴尬使我开始萌动选编出版的念头。事实上,透过诗歌沉寂的表象不难看到,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转换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中国诗人们在多重现实和文化压力下并没有屈服于精神的死亡。当诗歌经历了八十年代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众声喧哗,穿越迷雾来到九十年代末的今天,诗歌渐渐走进了当代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诗人们从八十年代群体、集团式写作走向九十年代的“个人写作”,

从喧嚣走向冷静,从激情澎湃的大气磅礴走向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诗性警觉,使诗歌深深地切入到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场和现实语境之中,诗人们以自己敏感的心灵唤醒着沉睡于普通读者记忆里的“中国经验”,从而折射出人类某些精神状态。这种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个性化感悟,使九十年代的先锋诗歌从“永恒的操练”和“神性的追求”中解脱出来,大大地贴近了今天复杂而多元的现实生活。作为一种高雅而又有可能走进普通读者内心的艺术样式,我以为九十年代的先锋诗歌没有理由像我们曾经知道一些远离人间烟火的诗歌那样继续寂寞下去。尤其在今天,当人们从浮躁的心态中走出,便开始不满于时尚快餐文化的缺钙、缺碘和营养不足,随着企业文化普遍提升,整个社会更多的人在呼唤并追求一种符合普通读者口味的精品文化。这种阅读心理趋向便是本书创意策划的主要背景。

考虑到这本诗选面世后的命运,我们颇为慎重地进行了多方的预测和把握。

一,诗选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书中所涉诗人大多数系同龄人),它应该有足够的吸引力召唤这一代人并使他们从书中获得观念与艺术的认同。同时本书将以其对朦胧诗的超越而为更多的曾经读着朦胧诗长大的一代读者乐于接受。

二,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选诗标准——“贴近当下生活,相对感性化,具备当代水准,有先锋性探索性,较能为诗圈之外的读者认同”的九十年代的诗作。这个标准一方面想打破诗歌界与读者之间的隔膜,一方面试图避开诗坛本身的门户之见。于是诗人涵盖面广,作品包容性强的特点几乎决定了这本选集可能成为迄今为止相对完整全面展现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创作成果的不可多见的版本。它试图使十余年来几乎断裂的诗歌历史得以重新衔接,同时对处于散兵游勇状态下的“个人写作”也是一次难得的集合和检

11186103

阅,从而为诗学评论和研究提供了一种充分的文本依据。

我的工作全在业余时间里顺理成章地进行着,和散居在全国各地的诗人们联络征稿,听取他们的想法。然后一连几十天浸泡在重庆高温酷暑的夜晚,不停地看稿,大汗淋漓地进行着一次世纪末的精神大会餐,从3000多首诗人的自荐作品中筛选出近300首,真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许多诗人在来信中赞赏选编这本诗集的构想和动议,称它的出版“对中国新诗发展来说将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义举,一件值得进入当代诗歌史的大事。”南方的诗人杨克在信中说“现在愿意为文学负责的人太少,而闲言杂语太多,你能站出来牵头为中国新诗做这件事,我们应是同道,诗人们敬重你,感谢你……”北京的一大批诗人侯马、臧棣、西渡、莫非、孙文波、谭五昌以及居住在北京的重庆诗人蒋浩等也常把电话打到家里,表示了他们对这本诗集的编选所寄予的厚望和关注;西安的伊沙,天津的徐江,河南的森子,上海的程勇,福建的道辉,安琪,哈尔滨的桑克,苏州的小海,浙江的彭一田,成都的雨田,袁勇,南阳的丛小桦,青海的马非等年轻诗人自发地为联络稿件热心奔走。书尚未面世,一时间却弄得中国偌大个诗坛几乎少有人不知。在此我向所有帮助我的诗人表示真诚的感谢。面对这样广泛的支持和信任,我突然感到肩上的巨大压力,我发觉这个使命般的重担似乎阴差阳错地落在了我的身上,而且没有了退路。我非常感谢他们,希望不辜负他们。但愿诗选的出版没有留下太多的遗憾。

这时,已是7月中旬,诗选的原初构想在动态的操作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延伸,一直到8月底,随着夏天的一场暴雨结束,诗选编选终于脱稿,成为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这个样子。全书选入了遍及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一百多位诗人的诗作二百余首。按照努力推出新人的原则,这本诗集选入的大多是九十年代崭露诗坛的年轻诗人。杨远宏先生在我的邀请之下十分投入地为诗集撰写了精彩

中国九十年代诗歌精选

的序言,杨兄以其对中国九十年代诗歌准确的宏观把握,在诗学上给本书所涉诗歌文本与批评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提供了一种辽阔、深邃、意味深长的思路和眼光。还需提及的是重庆诗歌评论家张育仁先生,为本书的编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我万分感动,在此一并致谢。

吴昊

1999.8.20.重庆

暗淡与光芒(序)

这是一个高尚与庸俗、天才与庸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时代。混乱,从终极关怀到世俗生存,从价值取向到价值虚无,从人文精神到灵魂崩毁,从新保守主义到结构创新,从新民粹、国粹派到人类、世界意识,从精英文化到快餐文化,从东方主义、后殖民语境到西方主义、本土意识……如此等等,掀开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丰沛鲜活、最具创造性也许也是最空洞死灭、最具耗散性的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一页。在愚昧无知或者浑水摸鱼欺诈的心机那里,或许一切都变得如此的茫无所适或不可辨认。而特立独行、睿智清醒的智者却洞若观火、明察秋毫。任何时代都没有、也不可能为诗歌宠儿提供一个全封闭的、完全自我生长的、自在自足的真空,而任何诗歌史从来也没有提供过在这样的真空中生长的、与它们的时代了无擦痕的诗歌。时代的混乱、焦虑、迷茫和问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势必带来诗歌的混乱、焦虑、迷茫、问路。这样的背景、思考和视角,让我们对无论是惊世骇俗、震荡亢奋而又涨潮般退去的第三代诗歌,还是对基本上是沉潜坚韧、精细练达有时也浪头喧哗的九十年代或第三代后先锋诗歌一目了然,剩下的工作不过是文本细读、专业指认。

如此的背景、思维、视角与精深、苛刻的文本细读、专业指认,让我们看到了从第三代诗歌中升起的、必将光照诗史群星灿烂的诗空。我没有必要重述那些被人们一再重述的或者大名鼎鼎或者小有名气的星座的名字,但是我仍然必须提到三位诗人;并不是这

三位诗人无可挑剔或我对其他诗人的轻视,而是因为他们格外引人注目地标举、代表了第三代诗歌在落日的余晖中越来越清晰地显现的三个诗学向度。作为诗人并在我们时代的诗歌版图上,欧阳江河,代表了我们的时代最聪慧、深邃、诡怪的诗歌知识和智慧,他为中国现代诗揭示、标举了一个思辨的、知识谱系的维度;西川,代表了我们的时代最优雅、高贵、纯净的诗意情怀和品质,他为中国现代诗提示、标举了一个诗学的、空间的维度;王家新,代表了我们的时代坚定的、最后的道义、良知的承担与见证,他为中国现代诗提示、标举了一个极富时间话语语境感的时间的维度。

现在我们转向九十年代诗歌。如果说第三代诗歌山头林立、杂乱无章但因其赤膊上阵、线条粗率我们仍不难廓清的话,那么,九十年代诗歌虽然分散沉落,但在时代诗学语境互涉互动中出场、凸显的几个诗学命题的观照下,我们仍可获得大致清晰、可靠的印象和指认。这些诗学命题是——

1. 边缘状态或民间写作

我看见,这个命题在一些诗人那里是一种与中心对峙的、不动声色的价值立场;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则是暗怀中心奢望和中心焦虑的一种姿态,一场表演。“边缘”或“民间”不过是他们试图通达舞台中心的一条悬空的杂耍钢丝。青年诗人、批评家臧棣对此一针见血:“我对在知识界中已成行话的‘边缘意识’心存疑虑。……边缘离天使太近,离历史太远。而在某些边缘、民间论者那里,除了党同伐异而外,我看不到一星半点真正的‘边缘意识’和‘民间立场’。”究其实,他们的所谓“边缘”、“民间”恰恰是反边缘、反民间的。臧棣的“天使”、“历史”说也太心怀天真和善意;依我看,某些边缘、民间的高调论者心怀叵测的,恰恰是深谙现实而妙算于现实之中,拒绝天使而离魔鬼不远。唐晓渡指出:“那种‘原教旨主义’意义上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身份’必定是可疑、张狂而危

险的!”王家新发问:“在现今果真有‘民间写作’这回事吗?在一个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已无所不在的社会,还有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唐晓渡的抗诉和王家新的质疑,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凸显了某种已然现实而发人深思。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边缘、民间都总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一个无论从什么生长、发展而来,不问其价值取向和价值样态,都先验地优越的边缘和民间?我们所面对并置身其中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缘和民间?我们的诗歌所期待、融入、推进的又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缘和民间?本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写作意识和诗歌立场,对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保持一定的疏离的、真正意义上的边缘和民间存在,对诗人的灵魂面对、精神超越和诗性智慧,都已经被艺术史反复证明是坚实、深厚而光辉的。但是,考虑到当下中国包括民间、边缘在内的社会/现实语境,被王家新所说的三种因素的全面渗透,尤其是挟裹着盲目无知的张狂排外、潜隐着错综复杂的社会/个人动机和不测危险的新一轮民族乃至种族主义准宗教狂热,我宁可对所谓民间和边缘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疑虑,而把思想留给更为深刻辽阔的社会/文化学,和更加精锐有效的诗学辨析和选择。

2. 个人化写作

相对于八十年代第三代诗歌大量的宣言式流派、集团倾向的集体写作(这在“整体主义”、“他们”那里表现得尤为显著)而言,九十年代诗歌对个人化写作的身份认定,既是九十年代权力/商业话语全面社会化并踞持中心背景下的无奈,也是在八十年代的狂躁喧嚣雪崩般退潮中沉潜下来的诗人对诗歌品质和艺术律动的觉悟与自律。在突如其来的无边寂静中,我们既听到了一声叹息,也看到了如暗夜雪花的光芒一样清澈明亮的目光。诗人们拖着自己落荒而逃的、孤零零的身影回到孤灯写字台,把这一切或者化为潜心

阅读的一枚书签,或者削为一支尖新专注的灵魂笔尖。这既是一场诗歌雄心与社会关切混杂不清的集体角逐、较量的失败,也是更遥远的艺术抱负、艺术职业道德对个体灵魂的成功呼唤。联系到这一切所赖以发生的背景,并将此置于“五·四”以来的新诗流变中加以思考,九十年代诗歌对个人化写作的认定和强调,比之任何一次流变无论是对诗人还是对诗歌,都更深入更本质更富于启示性。在阅读和写作都必需的寂静、沉思品质被一再推延之后,终于,潜心阅读和苦苦思索,取代了八十年代诗人们对蜂拥而来的新思潮惊喜张皇中皮毛仿写、乃至误读的竞赛、下赌式的信口开河,人们也在寂静中听到了诗人灵魂深处种子发芽悠长、精细的声音。诗外空间的收缩,带来了诗内空间的宽阔;诗人众多身份的减少,带来了诗人身份质地的增加。这使第三代诗歌硕果幸存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于坚、雨田、柏桦、张枣、钟鸣、韩东、严力、海男、吕德安、黄灿然、孟浪、西渡、王寅、宋琳、南野、周伦佑、陆忆敏等等诗人,呈现出越来越坚实娴熟、难以遮蔽的诗歌光芒与写作个性,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歌新人。这些诗人是:沉思辨析、深入到“写作的黑暗”中而又变动不居的蒋浩,对体验、发现入迷而显得超常冷静从容的森子,哲思洞悉的果决甚至武断与感性纤柔的犹疑不安、荒诞诡谲地集于一身的臧棣,精谨深邃而又冲和散淡的哑石,寂静黑暗而又迷恋于复调、叙事场景的马永波,典雅高洁、像“银针一样坚守”而又在“场境碎片式写作”中亢奋骚动、大喊大叫的安琪,在尖锐的深层体验、感觉型意象碎片中作非人格化荒诞抒情和虚无解构的余怒,在能指对所指无休止游离里、作从语言中生长语言的语言实验和“新死亡”语境实验的道辉,带着艺术家气质病态神经过敏而又幽深莫测、纤弱精微的阳子,既带有梦幻甚至梦游超现实主义气质又对现实的世俗生存作戏谑叩问的鲁西西等等,以及“在平静、无可挑剔

的结构”中“孤单叙事”的张曙光,怀旧的庞培,热衷灵魂游戏的童尉,怪诞的宇龙,过敏而沉痛的沉河等,都卓尔不群地展示了他们相当个人化的、独特的写作个性。应当单独提到当红诗人伊沙。作为八十年代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与“他们”诗派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近亲繁殖的畸变怪胎,伊沙切断了第三代诗歌对平庸腐朽的公众趣味反叛和革命的脉息,而把第三代诗歌某些诗人哄闹、阴谋、运动和操作的恶习,以媚俗甚至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时髦策略发挥到极至。他当然是独特的,他是以感官、享乐、肉身化为中心的平面、零散、解构、瞬间性的九十年代世俗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活标本。

在此,对蒋浩、安琪、道辉等三位新秀诗人的再次提及并非多余。在迄今可见的九十年代新人先锋诗歌写作中,蒋浩以其对灵魂的恪守和深度沉思,标举了诗歌中精神的维度和方向;安琪依傍庞德,以其携带体温、血痕斑斑的大规模“场景碎片”叙述性写作,凸现了血性生命的维度与丰富复杂;道辉对语言、词语几乎是走火入魔的痴迷与奇谲幻变的实验,启示了语言在诗歌中的可能与极限。而生命、精神、语言,正是整整一部现代诗学经得起风霜和时间消磨的坚果。

但是并非一切都无可挑剔。由于诗人对个人化强调到极端的沉溺,而对生存处境、社会语境的逃离和漠视,使他们的诗性话语和诗意语境变得小气、琐屑、漠然甚至萎琐平庸,全然肉身感官化;从现实撤退、内陷的结果,反倒奇怪、讽刺地生长了很现实的、与现实的异构同质。而“诗歌中的现实感如果不是在更为广阔的精神视野和历史参照中确立起来,就有可能是急躁的,时过境迁的”,而“肉体的变淡(也)没有来世”(欧阳江河语)。歌德甚至断言:“诗越是复归于自我之中,就越是走上了通向衰落之路。”诗人们断然拒斥道德和责任,萨特却“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看到了道德责

任”。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指出：“庸人们所最不乐意别人提醒他的就是精神上的贫困。实际上，庸人的最大的贫困在于不想知道自己有多么贫困。”对某些精神贫困而又极端个人化的诗人，巴雷特的提醒并不多余。

3. 知识分子写作

当下正在展开一场有关“知识分子写作”的论战。论题的简单明了与背景的复杂微妙，使这场论战在道义与邪念、风范与焦虑、理性与愤懑中盘根错节，“症候”迭出，带上了浓厚的蛮战混战表演战色彩。“而有关知识的一切话语从来就是一种奋争”，论战归根结蒂的引爆点不幸而被年轻的臧棣早早言中；更不幸的是，此种“奋争”竟然发生在作为知识者的诗人之间而不在别的向度。我无意混入这场混战，但问题必须澄清。

为了问题得到较清楚完整的反映，我不得不拉长有关引文。知识分子写作的提出者之一欧阳江河在同篇文章的一处说道：“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它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把写作看作偏离终极事物和笼统的真理、返回具体的和相对的知识的过程，因为笼统的真理是以一种被置于中心话语地位的方式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保留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终生热爱。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者”）作为一个有特定历史/文化积淀和内涵的命题以及由这个命题所外延的“知识分子写作”。在此，江河的表述基本上是准确的，但是问题依然存在。首先，既主张“偏离”即扬弃“笼统的真理”，却“又保留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终生热爱”；难道“笼统的真理”不是“任何形式的真理”中一种形式的真理？这是形式逻辑的

悖谬和混乱。其次更重要的是,江河的“知识分子写作”所采取的“典型的自由派立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是洛克、卢梭和潘恩的天赋权利——自然秩序论,边沁的“最大快乐原则”论,由天赋权利说和边沁学说所汇合而主张自由放任的科布登学派,和相信社会能够安全地建立在个性之上的自我指导、自由与平等的霍布豪斯的自由派立场呢?还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重新确立义务论伦理学所开启的、“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当代自由主义话语的自由派立场……亦或是哈耶克建立在人的理性限度和社会自生自发性质的社会理论之上而重述和建构的自由派立场?甚至是以哪怕是对极大值的灵魂/精神自由的放弃,去换取哪怕是极小值的肉身自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下中国的自由派立场?对此,江河应当有所限定,交待清楚,否则,只会给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已经够模糊、混乱的当下中国诗坛,再添模糊和混乱。

江河又说:“我所说的知识分子诗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我们的写作已经带有工作的和专业的性质;二是说明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与我前述同理,相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定内涵而言,江河表述的后者至多说对了一小半;而前者,使我联想到了近些年来知识界逃避乃至抽空思想和灵魂,甚至也具有极端可敬的工作和专业性质的、弹冠打坐的“朴学热”、“学术热”。而这种“使时代生活索然无味”的、没有血热的“冷热”,与知识分子的核心内涵没有半点必然的逻辑关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江河漠视思想/灵魂的知识情结、学术情结的无意绽出?如是,即便仅仅在知识分子命题之下,我们的想象和检讨,都应当是全面而惊心的!

我不必重复我已经发表过的关于知识分子命题的语义发生、历史/文化渊源方面的清理;在此,我愿便捷地沿用西川的阐释。西川说,知识分子是“专指那些富有独立精神、怀疑精神、道德动力,以文字为手段,向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代最重大问

题的智力超群的人,其特点表现为思想的批判性。”西川的阐释基本上是准确而可靠的。

至此,“知识分子”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知识分子诗人”、“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是尘埃落定、水落石出。在知识界乃至世俗社会灵魂、思想、精神几乎整体性全面崩溃的九十年代提出、强调知识分子写作,其意义无疑是及时、重大、不言而喻的。可以预期而又不幸的是,这一切竟然、也必然会引来敌视和论战。肉身与灵魂、思想、精神虽并不必然对立,但也并不必然相容,尤其是肉身去感受、享乐的贪婪、疯狂中滥觞为“肉身化”或者无知,人格/精神坍塌成为一种寡廉鲜耻的时髦,对抗与不幸就势必在前述二者之间发生。对那些心怀叵测,恶意将“知识分子写作”误读为凭借知识、炫耀知识的写作的人,对那些人格/精神侏儒,连知识分子的起码内涵也一无所知,却偏要来大谈特谈“知识分子写作”的人,我犯不着为他们作无谓的消耗和浪费,更不会对他们的冒牌论战过分善良和天真。不过我仍然必须指出:如果说“非非”是文化虚无主义的、笼统的、事实上反不了(“非非”即不可能)的反文化反知识,那么,他们在继承“非非”衣钵的同时,却对文化/知识所内含的文化/知识品格和思想,也来了个釜底抽薪。非知识论可能是一种因知识的饱满而“洞透天地的知识观”(西川语),更可能是因无知而妄生的狡诈和轻狂。同时我还必须提醒论战双方:我们时代更尖锐更应该关心和争辩的是“有与无”,而不是“多与少”、“是与非”。遗憾的是,我所看到的这场论战恰恰是向这方面用力的倾斜。

4. 叙事性

从张曙光开始,经由孙文波、肖开愚、马永波、安琪等诗人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也因一些诗人、批评家只见光芒不见阴影的一味推举,叙事性在九十年代诗歌中几乎成为一个先验地不证自明、凛然不可质疑的、优越显赫的话题。果真如此吗?

程光炜说,“‘叙事性’是针对八十年代浪漫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抒情诗风而提出的”。如果是这样,一个时代当然可以甚至应该有自己的开创的诗风;但如果先、后并不天然地成为价值优劣的尺度,那么,一个时代也可以沿承并推进、深化上一时代的诗风。而且光炜的“针对”暗含反拨,萎靡病态的布尔乔亚应当反拨;而在情感日渐苍白沉沦、理想泯灭的九十年代,对浪漫主义抒情诗风也必须不加分辨地“针对”,而将劫后余生的一点稀薄情感也非要反拨到零度不可吗?而“叙事性的主要宗旨是要修正诗与现实的传统性的关系”,这就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得让人莫名其妙:包括备受人们赞赏的《诗经》、唐诗宋词在内的诗歌的“诗与现实的传统性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否只有一个不可分的可疑向度而必须加以“修正”?除了叙事性对这种关系的或可修正好像就领有优先优越而外,其他如抒情性、戏剧性、对话性等等,有没有如此的“修正”功能,而对叙事性的优先优越构成质疑和挑战?其实如程光炜所综述的叙事性功能的四个主要方面,大多似是而非、散漫无边或了无新意。因其可疑可询之点不少,本文只能择其要商榷、发问。比如,难道可以不问叙事性内在的是何种质的规定性,就可以武断地断言叙事性必定会“打破规定每个人命运的意识形态知觉,使诗人不是在旧的知识——权力的框架里思想并写作,而是把自己毕生的思想激情和想象交给真正的而非虚假的写作生涯”吗?在叙事性与程光炜上述的一切之间,有这样的决定论、必然律吗?除叙事之外的其他写作形态,有没有光炜所说的“打破”、“不是”、“交给”的功能呢?其次,叙事性果真只会天降福音般带来“文化态度”、“人生态度的转变”乃至“高度的灵魂自觉性”,而与叙事的对象、样态和品格无关,可以不加限定和分辨吗?第三,“叙事意图的实现有赖于写作之外的高水准、对话性和创造性阅读”,但事实是,除“叙事意图的实现”之外的任何写作意图的实现,只要在

文本和阅读的双向都是高质量的,就都无不期待、“有赖”于这样的阅读。叙事意图并无先验命定的深奥、高质话语优先权。……如此这般,等等等等。看起来,光炜的叙事论更像一个现代诗学类特异功能的现代天方夜谭,或者一场叙事权力的就职演说。倒是西川始终保有界面的清醒,他“认为叙事在他的写作中只是一部分手段,而非全部;在叙事性以外,诗歌的因素还应有抒情性、戏剧性等”(程光炜语),而臧棣则审慎地仅把叙事看作写作策略之一种;他以一种“写作的限度”的清澈目光,对叙事性可能的权力转化与独占,既保持专业的、也保持文化语境/文化态度的打量和警惕。

本来,相对于八十年代的狂暴抒情而言,诗歌写作中的叙事性在九十年代的重述重构和显在,的确拓宽、丰富了诗歌写作的可能与空间。在人们健忘的幻觉中带来了一种新诗风。如果按照本雅明的理解,“心灵、眼睛和双手的那种古老关系……则是我们所发现的手工劳动的关系,叙事性艺术就驻足在这种关系之中。”那么,我们对九十年代诗歌中出现的叙事性,就大可不必那么痴迷地过高抬举,而应有一份本雅明式的清醒。对诗歌史常识的健忘所盲动的迎“新”庆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人们唱诗班式争相恭迎叙事的出场里,情感、灵魂、思想、精神却在社会的哗哗退潮中,甚至在诗歌叙事文本的底片上,也无迹可寻地缺席、退场了。

第三代后的九十年代诗歌,就要随着世纪末的落幕而落幕了。它留下了光芒和欢呼,也留下了苍白和叹息。我们也就要带着这一切走向下一个世纪了。

杨远宏

1999.8.17.于成都